

老子道經上

老子德經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
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
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愚之始是以
實不居
昔之得
靈谷錫
天下正
思費
無以生
賤為本
殺此且
欲祿
反者
有生

王卡 著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 綜述 · 目錄 · 索引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老子道經上

老子德經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

為之而無以為上德

之而莫之為上德

大德而後仁

者也

易之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王卡 著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 综述 · 目录 · 索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综述·目录·索引/王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04-4668-3

I. 敦… II. 王… III. 道教—研究—敦煌(历史地名)—隋唐时代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6257 号

特约编辑 张 弓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王卡，男，1956年12月出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明先生。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道教历史、教义及文献学二十五年。撰有《道教史话》、《新译道门观心经》等论著。新编《中华道藏》常务副主编。

序

王卡先生的学术课题——《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主体部分——〈目录篇〉与〈综述篇〉终于完成了。作为“同科”兼“同行”好友，我幸得先睹之缘。拜读这厚厚一叠书稿，心中不禁涌出浓浓的忻喜与感佩之情。说忻喜，是看到王卡不吝倾注的无量心血灼然育为硕果；说感佩，是瞬间又想起他默默耕耘的漫长来路。范文澜提倡“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治学精神，王卡秉此箴言以行，却已走过二十多个春秋了。

王卡学的是宗教学，我学的是历史学。彼此虽然学非“同门”，却是“同科生徒”——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1978—1981）学生，即被戏称所谓“黄埔一期”者。而且不仅同一科甲，后来又成了“同行”——两人以后从各自的专业（道教研究与唐史研究）出发，在敦煌学的“厅堂”里不期而遇。那是1981年夏秋，我们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和历史所）工作。他为阅读敦煌写本《老子河上公注》，我为阅读敦煌寺院文书，不约而同地去到王府大街北端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阅馆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当时科图的阅览条件较差，几台原始的阅读器，偏促于大厅过道一隅，读者来去须从旁侧身而过，互相干扰，难以安宁。阅读器又年久失修，摇柄吱呀作响；胶卷亦老旧，每有折断。科图食堂不对外，中午尚须自备干粮。然而我们又知道，这一套馆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珍贵难得。因为当时还没有敦煌文献图版本问世，北京得此庋藏的单位亦甚少。可以在这里读到摄自伦敦和巴黎的敦煌胶卷，比起许多无缘的同仁，我俩算是幸运的。

岁月匆匆。待到十七年以后的1998年，一次奇妙的学术因缘居然进而让我们两人并肩“攻关”了。这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

院成立敦煌学研究中心，我们两人同时成为“中心”的特约研究员。9月，王卡申报“敦煌道教文献研究”课题，我牵头申报“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面简称“敦煌典籍”）课题，同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而在“敦煌典籍”课题中，承担“道典章”撰稿的也是王卡。“敦煌典籍”课题是“中心”的集体项目。当初筹建课题组，我去宗教所拜访他，请他负责敦煌道教典籍部分，他爽快地答应了，毫无犹豫。如今获准立项，真正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了。此后五六年间，王卡一面做着自己的课题，一面参与“敦煌典籍”课题。确定整体思路，建构写作大纲，讨论样稿，商榷初稿，课题组历年在历史所召开的几次专题讨论会，他每场必至，畅述己见，发言有独到见解，给大家以启发。记得有一次讨论敦煌典籍分类，王卡说，在敦煌道教典籍中，有道家医方养生方和道教讲经文两种文献，前者又可看作医药典籍，后者又可看作文学典籍。他提出敦煌典籍性类多义的重要现象，引起热烈讨论。同仁们最后达成共识：凡性类多义的敦煌典籍，不妨分别纳入相关类项中，多角度去研究；充分揭示它们的多类样貌，正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任务。

近年，我与王卡分别主持的两个课题相继完成并结项。先是读到他为“敦煌典籍”课题撰写的〈道典章〉，后来又读到〈综述篇〉和〈目录篇〉，越发觉出这些文字的沉甸甸的分量，也对他的辛劳与甘苦越发感同身受。

敦煌典籍文献写本是我国进入刻本时代之前现存的最大一批文化典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道教文献是它的重要部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敦煌学界对它的关注不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学者对敦煌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得较多，大渊忍尔的《敦煌道教目录编》（1978年）是其代表性成果。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相继投入敦煌道典的揭示、整理与研究，成绩斐然，王卡是其中一位佼佼者。这部《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篇〉、〈目录篇〉），可以看作是他从事敦煌道典整理与研究二十多年的一次学术集成，或者称作一次学术总结。

本书的〈目录篇〉，鄙意以为它具有四大特色（优点）：搜集

完备，拼合细密，体例合理，检索便利。

（一）搜集完备。〈目录篇〉著录各类敦煌道典达 800 件之多（大渊《目录》为 496 件），不仅囊括英国、法国、俄国、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敦煌度藏地的全部已知道典甚且将中国各地及世界各角落的已知散藏道典，悉数收纳其中。从学术眼界与规模来看，王卡的敦煌道典研究具有显著的整合性与集成性，是目前最完备的《敦煌道典目录》。

（二）拼合细密。所著录的 800 件文献中，有 140 件系被割裂成为 423 块残片，经缀合而成。其中有他人的缀合成果，但大多是王卡自己做的。敦煌文献缀合，看似琐细，实则甚难。缀合工作不仅需要细心与耐心，更要求对典籍极熟谙。本书所附〈残卷缀合编号索引〉显示的缀合成果表明，尽管王卡很少有机会出国考察原卷，但是凭着他熟谙道典和心细如髮，居然做出了令人惊叹的缀合成果。有一件“太上洞玄神咒经卷第五”，原卷割裂为五，分别收藏在北京国图、巴黎、圣彼得堡、北京大学，王卡竟然从分藏诸国的万千残片中发现这五片残卷的缀合关系及其排列顺序，使成“完璧”。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问他怎么会缀合那么多道典卷子。他说这得益于他此前参加《中华道藏》的整理，日夕沉浸于辨析、阅读之中，使他对各类道典均甚熟谙。再面对各种被割裂的敦煌道典残卷，也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了。

（三）体例合理。王卡指出大渊《目录》的一大缺点，是它的体例没有遵循唐代道经业已形成的三洞四辅体系，而是主观自定六大类。本书〈目录篇〉则按三洞四辅七部分类，另加“类书丛书”、“相关文书”、“失题待考”等，共十大类，著录全部敦煌道典，使唐代道藏体系的样貌藉此类分而得展示，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检索便利。〈目录篇〉为敦煌道教文献分别编制〈简明目录〉、〈分类叙录〉、〈编号索引〉（含诸家皮藏、散藏、吐鲁番所出、缀合表、抄经表、授经表、道观表）等项，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敦煌道典的系统而完整的多元学术信息。新设“类书丛书”、“相关文书”两个类目，收入敦煌道典中为数不少、难以归类于三

洞四辅、且同我国中古时期道教文化发荣及民间道教活动密切相关的文献，为大渊《目录》所无。这两个类目的设制，显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它为中古道教传统文化及民间道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宗教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学者会大有裨益。

本书〈综述篇〉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见解。个人妄测，王卡这部《目录》，将成为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必备工具书而被学者常置案头，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有新《目》取代它。

书稿即将出版，王卡索序于我。有感于我和他的同甲深缘、同道厚谊，情不获已，写下这篇文章，一则推荐好书，也藉此为我们的珍贵学谊留下忆念片羽。

张 弓

2004年5月于京东云鹤斋

目 录

序	张 弓 (1)
---------	---------

综 述 篇

一 敦煌道教的历史概况	(3)
(一) 汉末魏晋河西道教的传播	(3)
(二) 北朝隋唐敦煌道教的兴盛	(6)
(三) 安史乱后敦煌道教的衰落	(9)
二 敦煌道经与一切道经	(17)
(一) 唐代道藏经的形成	(17)
(二) 唐编开元道藏拾遗	(21)
(三) 敦煌道经的文献价值	(26)
(四) 敦煌道经的分类编目	(30)
三 敦煌地区的道教行事	(33)
(一) 道教写经造像及讲经文	(33)
(二) 敦煌道教的斋醮法事	(39)
(三) 道士修持活动及法术	(49)
(四) 道教法术对佛教的影响	(56)

目 录 篇

叙 例	(65)
一 敦煌道教文献简明目录	(73)

二 敦煌道教文献分类叙录	(84)
(一) 洞真上清部	(84)
(二) 洞玄灵宝部上	(92)
(三) 洞玄灵宝部下	(116)
(四) 洞神及洞渊部	(140)
(五) 太玄部上	(158)
(六) 太玄部下	(193)
(七) 太平部	(213)
(八) 太清部	(214)
(九) 正一部	(219)
(十) 道教经目及类书	(221)
(十一) 道教相关文书	(230)
(十二) 其它	(244)
三 敦煌道教文献编号索引	(254)
(一)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254)
(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262)
(三) 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本	(273)
(四)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276)
(五) 中国各省市散藏本	(279)
(六) 日本欧美诸国散藏本	(281)
(七) 已知吐鲁番道教文书	(282)
(八) 残卷缀合编号索引	(283)
附录	(291)
1. 经书抄写监校人名及年代表	(291)
2. 传授经戒人员表	(294)
3. 道观名表	(295)
四 敦煌道教文献收藏备览	(297)
后 记	(312)

综 述 篇

甘肃省河西地区古称陇西或凉州。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汉族政权与西北各民族政权（如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等）为控制西域而竞相争夺的要地，同时也是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各国相互朝聘、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多民族的杂居和中西交往的频繁，使河西地区，特别是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而这种多样化的文化色彩，在宗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自汉魏六朝以至隋唐五代，河西地区存在的外来宗教，有来自南亚的佛教、西亚波斯的火祆教、摩尼教、景教。这些外来宗教首先传到中亚和西域诸小国，然后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但是河西地区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不仅有来自西方的影响，而且也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文化；不仅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也有道家 and 道教文化的影响。

汉魏六朝正是中国道教开始从民间兴起，并逐步发展为成熟的正统宗教的时期，隋唐五代则是道教极为兴盛的时代。作为在中国内地越来越兴盛的宗教，道教在河西地区也有所传播，并留下许多遗迹。近年来，关于汉魏六朝至隋唐时期河西地区道教发展的状况，以及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道教遗书对道教历史及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注意，并有许多研究成果。下面仅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就此略作概要的介绍。

一 敦煌道教的历史概况

（一）汉末魏晋河西道教的传播

中国道教形成于东汉后期（约公元二世纪），首先出现的道教教团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据史书记载，太平道传播于中原地区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五斗米道则在西南益州的巴蜀、汉中地区流传。西北凉州不是原始道教活动的范围。但是我们知道，早期道教的产生与当时民间流行的“鬼道”，即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和巫术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河西凉州也是巫鬼道术流行的地方。太平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失败后，以公元189年西凉军阀董卓进京为契机，东汉王朝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大乱局面。在董卓率领的西凉军团中，就有巫师术士的活动。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载：当吕布和王允合谋杀董卓之前，董卓军中“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这件事亦见于南朝志怪小说《幽明录》：“董卓信巫，军中有巫都言，祷求福利。言从卓求布，仓卒无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便书布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况吕布也。”^①董卓因不能明白巫师都言的谶语，遂为吕布所杀。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也信巫。《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记载：“〔牛辅〕常把辟兵符，以铁钺致其旁，欲以自强。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得兑上离下。巫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即时杀越。”董卓部下悍将李傕更迷信巫术。《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云：“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

^① 《太平御览》卷735引，中华书局影印本。

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又于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座，数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固持节，拜催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为得鬼神之力，乃厚赐诸巫。”这些西凉军阀对巫师道士的迷信，说明汉末凉州也是“鬼怪左道之术”流行的地区。这对于号称“鬼道”的五斗米道传入陇西，无疑是有利的条件。

汉末魏晋，五斗米道传入河西，与当时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迁徙也有重要关系。汉末三张在巴蜀汉中传播五斗米道时，当地“俗信鬼巫”的巴夷、賸人等少数民族在首领杜获、李虎等人率领下，归依张鲁。后来曹操攻入汉中，张鲁出降，大批信奉五斗米道的汉中民众随曹军北迁，其中也有许多巴夷、賸人随其首领迁到秦陇山区。例如祖籍巴西宕渠的賸人李虎部落，就是当时北迁的少数民族之一。《晋书·李特载记》云：“李特，字玄修，巴西宕渠人。……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李虎）将五百馀家归之，魏武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氏。”

像李虎这样北迁的西南少数民族部落还有许多。我们知道，四川西北、秦陇山地以至河西、青海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氏族、羌族世代居住之地。秦汉魏晋时代，西南少数民族和西北氏羌族穿越秦陇山地，频繁的南来北往，相互间有宗教文化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汉末巴夷、賸人北迁，与西北氏羌族杂居，号称“巴氏”，其五斗米道信仰因此而影响氏羌族人，并传播于河西地区，这是很有可能的。到了西晋末年，秦陇六郡的部分巴賸和氏羌族流民，随李特、李雄父子南返，在四川青城山道士范长生支持下，建立成汉政权，使五斗米道复兴于巴蜀^①。其后十六国时期，氏族和羌族在华北建立的前秦苻氏、后秦姚氏政权，其信仰中也有五斗米道的巫鬼之术^②。

① 参见唐长孺：《李特据蜀与范长生之关系》（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

② 参见向达：《南诏史论略》（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

除上所述外，道教在汉末魏晋传入秦陇及河西地区，还有一些史料可为证据。《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及《晋书·武帝记》载：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炎袭晋王爵，欲图篡魏，“是月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馀，跡长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单衣，黄巾拄杖，呼县民王始云：今年当太平”。这年十二月，司马炎果然代魏称帝^①。按襄武县魏晋时属陇右临洮郡，在此地出现的“大人”，黄巾拄杖，其形象近似汉末太平道师，又对县民王始宣告“太平”谶语，这说明当时已有道士活动于陇西地区。又据《晋书·慕容德载记》及《十六国春秋·南燕录》记载，十六国时南燕建平四年（403），“妖贼王始聚众于泰山，自称太平皇帝”。这位“王始”可能也是民间道士化名，与太平道有关。

近人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45页，收入敦煌出土的道教木简符箓一枚，其正面文字为“仙师敕令三天贵龙星镇定空炁安●”，背面文字为：“金木水〔火土〕。”据陈槃先生《敦煌木简符箓试释》一文考证，这枚木简是五斗米道的符箓，大约为魏元帝景元四年（263）之物。这是魏晋之际天师道已传入河西地区的重要实物证据。

十六国时期，一些汉族和异族政权占据河西地区。当时佛教在该地盛行，而道教也有所传播。《晋书·隐逸传》记载前凉张茂时，敦煌有隐士索袭，虚静好学，游思于阴阳之术，“味无味于恍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颇具道家风度。按索氏为敦煌大族，敦煌遗书中有不少索氏族人抄写的道经。如《老子道德经》即道士索洞玄所抄。又据《晋书·文学传》记载，十六国时著名道士王嘉（即撰写《拾遗记》的王子年），受前秦国主苻坚、苻登礼遇，后来被后秦主姚萇杀害。据道书《洞仙传》和《王氏神仙传》记载，王嘉死后尸解，与弟子逃往陇右。这虽属神话，但也可说明当时河西应有道士活动。道教早期信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称：北凉国主沮渠蒙逊，“至盐池

^① 按此事又见于《混元圣记》，该书卷七引《晋书》曰：“魏陈留王时，咸熙元年甲申，老君降现于陇右临洮郡襄武县，身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戴金冠，告县人王始曰：天下不久当太平。及〔晋〕武帝受禅，果天下统一，帝乃令于〔老君〕所现处造太平观，即李宗之故居也。”

(今青海湖)祀西王母,寺中有玄石神图”。近年发掘的十六国五凉时代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有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形象^①。在敦煌莫高窟的北魏 249 窟、西魏 285 窟顶部壁画,也绘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分别驾龙凤车出行,前有方士开路,后有神兽随行的场面。可见河西地区崇奉西王母由来已久。

总而言之,道教自东汉末形成后不久,即在魏晋及十六国时期传入河西地区,为后来当地道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 北朝隋唐敦煌道教的兴盛

公元 439 年,北魏攻克凉州,灭北凉沮渠氏,随后又将其残余势力逐出敦煌,重开通往西域之路。自此之后,直至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三百多年间,河西地区一直处于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等中原王朝的控制下。这一时期中国从分裂趋于统一,国力逐渐强盛,中西交流畅通无阻。中原地区的道教也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兴盛。北魏初,著名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受魏太武帝拓跋焘赏识而盛行于北朝。西魏北周时,又有楼观道派兴起于关中,得到周武帝宇文邕等统治者的支持。隋朝统一天下后,原在江南地区流行的上清、灵宝等符咒道派,与北方关洛地区的天师道派,在教义及科仪方术上交流融合。到了唐代,道教由于皇室的崇奉而发展至鼎盛时期。

北朝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中原地区道教的日渐兴盛和中西交流的畅通,使敦煌及河西地区的道教也大为发展和兴盛。虽然现存史籍对西凉边地的宗教状况记载甚少,但敦煌石室中发现的道经抄本,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抄本,现已公布的图片编号总数多达数万件。据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日·福武书店 1978 年出版)的著录,其中与道教有关的抄本共计 496 件(内有少许吐鲁番文书)。近二十餘年来,随着各国所藏抄本图版陆续

^① 参见《文物》1979 年第 6 期载《酒泉嘉峪关魏晋墓的发掘》。

公布，以及各国学者的搜寻和研究，敦煌道经抄本总数大有增加。据笔者所知，至2003年已公布图片，或学者论著披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道经抄本数已有800多件编号。其中已考定或拟定经名的道书，约有160种（另有不多的失题道经残片）。这些道书的内容，包括三洞经典、论疏、道家诸子、科仪法术；道教类书、诗集、话本、讲经文、斋愿文、镇宅文等。这些道经及文书既可弥补现存《道藏》经书的缺失，又为研究敦煌地区道教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道经中，有些抄本末尾附有题记，记录抄写和监校者的姓名、身份，抄写地点、年代、事由，以及道师传经授戒的盟誓词。合计有五十余条。将这些题记搜集起来，研究其中出现的人物、道观、年号及盟誓词，就可知道当时敦煌道教的发展状况。（陈祚龙先生编有《敦煌道经后记汇刻》，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附录有敦煌道经中所见的《道士名表》、《道观表》、《有纪年道经表》）。此外有些不属于道教的敦煌抄本，如图经地志、医书药方、历日占卜、伪佛经等，其中也有关于道教活动的零星资料。

根据对敦煌抄本中出现的年号，及抄本纸质、字体的研究，已知敦煌道经的抄写年代，大多在南北朝末至唐前期（六至八世纪中叶）。出现最早的年号是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最迟年号为唐肃宗至德二载（757）^①。隋唐年号的抄本，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和玄宗的年号最多，而且多是在优质黄纸上楷书精校的道经写本。也有少许用于支纪年的道经，及字体纸质粗劣的文书，抄于吐蕃占据期及归义军统治期（即中晚唐至北宋时期）。大约以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界限，此前有大批楷书精美的正规道经抄本，此后正规道经愈来愈少，而代以木笔写或草书体的文书。这种书写风格和用纸的差别，恰好反映了敦煌道教盛衰的历史。唐代前期的鼎盛与中晚唐以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

敦煌道经及《沙州图经》等抄本中，见有八座唐代沙州地区道教宫观名称：灵图观（P. 2005、2695）、冲虚观（P. 2347、散

^① 见京都253《灵宝妙经众篇序章》、P. 2735《老子道德经》抄本。